

古典民主原論

M. I. Finley 著
李淑珍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古典民主原論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M. I. Finley 著
李 淑 珍 譯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典民主原論/Moses I. Finley著；李淑珍譯
——版，——臺北市：巨流，民80
面；公分
譯自：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含索引
ISBN 957-9464-61-8（平裝）

1. 民主政治—歷史 2. 希臘—政治與政府

570.9401

80001161

民國80年7月一版一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古典民主原論

著者：Moses I. Finley

譯者：李淑珍

發行人：熊嶺

編輯：彭嘉蕾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地址：100 臺北市博愛路25號312室

電話：(02)371-1031 314-8830

郵購：郵政劃撥戶01002323

傳真：(02)381-5823

國際書號：ISBN 957-9464-61-8（平裝）

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45號

定價：台幣150元

獻給 1948~52 年間
洛特格 (Rutger) 大學的朋友和學生

• 譯者簡介 •

李淑珍

學歷：臺大歷史系畢業（民國 72 年）

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民國 75 年）

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肄業

現在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肄業

經歷：曾任清華大學共同科兼任講師（民國 75-77 年）

目 錄

作者小傳	1
黃序	黃俊傑 5
譯序	11
增訂版序	15
初版序	17
第一章 領袖與群眾	19
第二章 雅典群眾煽動家	49
第三章 民主、共識與全國利益	79
第四章 言論自由的尺度	107
第五章 古典時代的檢查制度	131
名詞索引	155

作者小傳

本書作者摩西·芬理（Moses I. Finley, 1912-1986）是聲譽卓著的希臘古史大家。他英銳早發，十五歲即以優等成績畢業於美國西拉古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十七歲時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公法碩士學位（1929年）。一九三三～三四年間，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羅馬法教授謝勒（A.A. Schiller）的研究助理，首度從法律層面入手，涉獵歷史領域。

一九三〇年代正值美國經濟崩潰，歐洲法西斯主義蔓延的擾攘時期。當時歷史學者雖然各有一己政治主張，但在史學研究上謹守學術本位，與當下現實無涉。這種心態不能饜足青年學子的智識渴望與情感焦灼，芬理與同儕朋友轉而自我教育，從相互辯難中汲取智慧，得到的收穫要比課堂上的正式學習豐富得多。他廣泛涉獵布洛克（Marc Bloch）、比寧（Henri Pirenne）、魏伯蘭（Thorstein Veblen）、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斯卡（Gaetano Mosca），以及巴瑞圖（Vilfredo Pareto）等人的著作。芬理自承馬克斯給他極大的啟發，使他領悟：歷史研究不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活動，而是和經濟、政治、宗教等各種人類活動不可分割，他的整體（holistic）史觀即淵源於此。此外，韋伯的方法學理論（以「理想型」為主）和社會分析（重視「秩序」order與「地位」status，有別於馬克斯的「階級」觀念），

也對芬理留下很大影響。

當時在納粹黨人的壓迫下，德國許多一流人才紛紛流亡海外。一九三四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主持的「社會研究學院」（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從法蘭克福遷往紐約，志在延續德國左派知識傳統——包括康德的認識論、新興的現象學（尤其是狄爾泰 Dilthey 的學說），以及以馬克斯為主的對黑格爾的唯物批判。這個機構和哥倫比亞大學關係密切，芬理活躍於他們的討論會上，參與學刊著述，協助翻譯，從中得到了歷史哲學及方法論的深刻訓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芬理在軍中服役五年。一九四八～五二年間，他任教於洛特格大學，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博士論文《古雅典的土地和資金》（*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這段期間他親炙哥大經濟史學家普蘭尼（Karl Polanyi），相當程度地接受了普氏「實質經濟」的概念，認為「市場經濟」的理論不適用於古代社會；古典時代的經濟運作實和宗教、政治等因素有糾葛交錯的複雜關係。就某個意義而言，這也是上述整體史觀的一個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芬理並不假定「物質基礎」與「意識型態上層結構」之間有單一簡化的關係，也不認為經濟型態在社會文化發展中居主導地位。

芬理不僅活躍於學術圈內，也在通俗雜誌、報紙、教科書，乃至廣播、電視上積極發表譴論。他抨擊現代意識型態對古代世界的曲解濫用，討論古典研究面臨的危機、古史學者應有的訓練，並擴及中等學校的課程及教學。他對現實世務的勇敢參與，不見容於當時的保守勢力，終於導致他在一九五四年離美赴英。此

後在劍橋大學長期任教研究，並曾在一九七六～八二年間擔任達爾文學院院長。他在一九八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註）。

芬理的代表著作：

《古雅典的土地與資金研究》（1952, 1985）。

《奧德賽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 1954, 1977）

《古史面面觀》（*Aspects of Antiquity*, 1968）。

《阿拉伯征服之前的古西西里》（*Ancient Sicily: To the Arab Conquest*, 1968, 1979）。

《早期希臘：青銅及上古時代》（*Early Greece: 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 1970, 1981）。

《古代經濟》（*The Ancient Economy*, 1973, 1985）。

《歷史的應用與濫用》（*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1975）。

《古代奴隸制度與現代意識型態》（*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1980）。

《古希臘的經濟與社會》（1981）。

註：以上關於芬理的學術旨趣的簡介，主要是根據 Brent D. Shaw 以及 Richard P. Saller 為芬理所編論文集《古希臘的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Viking Press, 1981）中的編者導論。

黃 序

黃俊傑

這部《古典民主原論》是英國劍橋大學已故希臘史前輩學者芬理（M. I. Finley）所著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一書的中譯本。芬理教授在這部小書裡，以他一貫流暢清新的寫作風格，縱談古代希臘民主政治生活的幾個側面，並隨時取之與現代民主政治生活互作比較，出入古今，縱浪大化，確係不可多得的佳作。這部書的中譯者李淑珍小姐畢業於台大歷史系，獲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現在在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李小姐譯事嚴謹，文筆流暢，我很高興在出版之前先閱讀這部書的中文稿，謹應譯者及出版者的邀約，簡單談談我讀這部書的感想，以就教於讀者。

自從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大量交流以來，中國知識界所獲得的關於西洋的知識日益增加，許多知識開始注意到中西歷史傳統的相異之處。例如清末言論界重鎮的梁啟超（任公，1873-1929）論述〈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飲冰室文集》）時就鄭重指出：「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給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任公認為希臘文化以城邦為中心，這種特質正與中國文化中國家思想發達，充滿世界

精神的特點構成明顯的對比。任公以後，對中西歷史的差異這個問題有所反省的是熊十力（子貞，1885-1968）。熊先生首先注意到先秦時代與古希臘史的面貌很相近這項事實。他說：「今西洋學術或文化，其根源實在希臘。吾儕試尋諸子百家之微言碎義，持較希臘，似未見西方路自有甚隔截處。然而希臘直啓現代文化。吾晚周諸子百家則早絕於距今二千數百年前，一蹶不可復振。」理由何在呢？熊先生認為其主要原因是：「秦漢之後環境改變，政制不良，遂以惡因，植茲惡果」（見：熊十力，《讀經示要》，卷二）。梁任公和熊十力這兩位近代中國思想家都指出，古代中西歷史的差異在中國的帝國一統與希臘的城邦分立這項事實，並都有所揄揚月旦於其間。梁任公甚至在〈上南皮張尙書書〉中明白提出以希臘羅馬古史與中國歷代史事配合教學，以改革中國教育，培養時代所需的人才，梁任公說：「故爲今之計，莫若用政治學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兩湖之舊而示以所重，以六經諸子爲經，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書輔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歷朝掌故爲緯，而以希臘羅馬古史輔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當今時勢爲用，而以各國近政近事輔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當有事，數事並舉，則學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於古，何者戾於古，何者當復古，何者當變古，古人制度，何者視今日爲善，何者視今日爲不善，何者可行於今日，何者不可行於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於中國，何者不可行於中國，何者宜緩，何者宜急，條理萬端，燭照數計，成竹在胸，遇事不撓，此學若成，則眞今日救時之良才也。」（梁啓超，〈上南皮張尙書書〉，收入：《飲冰室文集》之一）。

梁任公所說的這一段話，明顯地想從希臘羅馬古史所見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的靈感，以解決當時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其實，對於古希臘的歷史經驗，不僅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充滿了嚮往之情。對於近代歐美人而言，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也永遠代表一段美好的歲月，近代歐美人對它充滿了孺慕的情懷。例如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革命以前，北美十三州的居民就不斷地引述古希臘民主政治，以及羅馬的共和政府的歷史經驗，來作為他們革命的歷史根據，這固然和他們的念舊情懷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對他們所處的現實環境有極大的啓示作用。而近代中西文化接觸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西方民主制度尤為神往，除了上文所說的梁任公、熊十力之外，魏源、梁廷枬均嘗介紹西方議院制度，一八九五年康有為更有「公車上書」中正式向皇帝建議全國每十萬戶選舉一位代表為「議郎」。五四以後，「德先生」（民主）更與「賽先生」（科學）並駕齊驅而為中國知識份子心神嚮往的建國目標矣。這樣一個永遠為後人所景仰懷念的民主政治的時代是如何塑造而成的？什麼人才享有公民權？在這個民主政治昂揚的時代中，公民的政治生活如何？這些近代人所關懷的問題，都可以在芬理教授這部書中找到部份的答案。

更具體地說，《古典民主原論》這部書從兩個方面展現芬理教授的學問的特殊風貌：

芬理教授治希臘古史自有其現代關懷，誠如本書譯者在〈譯序〉中所說：「芬理從現代時空下的問題意識出發，重新詮釋古史，見人所未見；緊接著他又根據古代經驗，回頭痛陳時弊，言人所未敢言。」芬理教授的學問的這項特殊風貌通貫於他的許多著

作中。舉例言之，芬理教授在他另一部書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1, 1975) 的〈序言〉中，就指出他研究希臘古史一直關心的問題是，在學術界、政治界乃至一般的文化生活領域中，人們如何理解過去的歷史經驗。芬理這種「通古今之變」的治史立場，也在本書中展現無遺。在本書第一章裡，芬理這樣解釋他的立場：「我所以不厭其詳談雅典民主的某些機制，不是出於研究古董的好奇，而是爲了想說明：雖然它和現代民主相去甚遠，但是這個古代經驗並不像現代政治學家所想的那樣與目前完全無關，特別是在『領袖與群眾的關係』這個引人爭議的問題上。」（本書頁40）。從這樣一個類似於中國傳統史學的經世立場出發，芬理揭示現代民主政治的缺陷，他說：「雅典由是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個案，顯示『政治統馭』和『民衆參與』如何長期並行不悖，既沒有民意專家所揭露的冷漠與無知現象，也沒有精英理論家揮之不去的『極端份子運動』夢魘。」（本書頁44）。個別的讀者或古史學家，對於芬理的特定論點，容或有仁智之見，但是對芬理努力於會通古今的氣魄，則多一致景仰。

但是，這種「史學經世」的治學立場如果持之太過，也有可能因過度強調「古爲今用」而流爲「影射史學」，也有可能因太重視「以今釋古」，而扭曲古史，造成一種「山高月遠見月小，遂覺此山大如月」的錯覺。這兩種弊端，在芬理的論著中都未嘗出現。芬理教授研治古希臘史，心思細密，一皆以史料爲依歸，故能在「史」與「論」之中保持平衡。即以本書爲例，芬理教授在本書第五章論「古典時代的檢查制度」時，特別強調在古代社

會中知識或資訊的流通，並不完全依賴書面文字，因此我們討論古代識字率問題時，不可以將觀點僅局限在具有讀寫能力的人口之上。芬理教授雖力求「通古今之變」，但他處處努力還古人以真面目，實事求是，這種治史態度特別值得我們欽遲。這是芬理的學問的另一個特殊風貌。

近年來的台灣，隨著戒嚴令的廢除與社會力的解放，民主政治獲得了空前的試驗機會，這是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在這個歷史扉頁翻動的關鍵時刻裡，我們迫切需要從歷史上汲取智慧的靈感。啓蒙時代的法國大哲伏爾泰（Frans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 1694-1778）就曾說過，帕里克里斯時代的雅典、奧古斯丁時代的羅馬、麥地錫家族全盛時代的意大利以及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是人類歷史上的四大黃金時代。現在讓我們一起從這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古典時代的希臘——的經驗出發，走向更正確的未來。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
序於台大歷史研究所

譯 序

本書是芬理晚年的小品，初版印行於一九七三年，由三篇演講結集而成。他藉著探討古雅典的「領袖與群眾」、「民主、共識與全國利益」以及「自由的尺度」，針砭當代政治精英理論。精英論學者認為今日英美社會中普遍的政治冷漠是民主制度下的必然、應然現象，可以防止極端份子的政治狂熱危害社會穩定。芬理則以古雅典的直接民主為例，說明群眾冷漠並非民主政治的常態，而是現今代議政治下的病癥，是群眾對自己被排斥在決策過程之外的一種無力感的反映。精英理論家不僅不思如何對症下藥，反而將大眾的冷漠疏離美化為民主政治的健康合理狀態，說穿了，不過是替少數職業政客壟斷政治張目而已。在一九八五年的增訂版中，芬理增加了〈雅典群眾煽動家〉及〈古典時代的檢查制度〉二篇論文，對古希臘、羅馬的政治文化有更進一步的剖析。本譯本即是根據此增訂版逐譯。

就筆者看來，本書的價值在於兩個方面：芬理從現代時空下的問題意識出發，重新詮釋古史，見人所未見；緊接著他又根據古代經驗，回頭痛陳時弊，言人所未敢言。芬理引以自豪的是後者，這點，從他的生平學術旨趣中可以看得出來；而對一向強調「以古鑑今、學以致用」的中國讀者而言，後者也可能更容易激起共鳴。